

开拓社会历史批评的广阔前景：王守仁教授访谈录

Expanding the Horizon of 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Shouren

刘 洋 (Liu Yang) 王守仁 (Wang Shouren)

内容摘要：在本次访谈中，王守仁介绍和回顾了自己从英国文学到美国文学、世界文学的文学研究历程。在王守仁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遵循社会历史批评范式，深入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复杂关系，注重将文学创作置于历史语境考察，在文学与历史-社会的各种关联中揭示作家对生活和时代的洞见。王守仁通过对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的系统性研究，创新社会历史批评，指出文学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建构现实，具有认知和审美价值。王守仁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融通中外的同时，坚守中国批评立场，保持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性。他翻译英语文学作品、编纂各类外国文学史、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发表论文专著，形成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品格，为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王守仁；社会历史批评；外国文学研究；现实主义；外国文学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刘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学、现实主义小说与理论；王守仁，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现实主义、英语教育。

Title: Expanding the Horizon of 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Wang Shouren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Wang Shouren introduces and reviews the journey of his literary research on British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an academic career of almost 40 years, he is apt at applying the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to make nuanced contemplation o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Juxtaposing literature with its historical context, his studies illustrate the authors' insights into their life and time by relating literature to socio-historical factors. Wang Shouren's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realism brings new life to 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predicates that literature creates cognitive as well as aesthetic values in its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Wang Shouren's research on foreign literature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meanwhile, he insists on the Chinese standpoint and maintains his own subjectivity as a Chinese scholar. Through translating literature in English, editing foreign literary histories and encyclopedia entries, and publishing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he demonstrates a character of praxis which is nourished by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mak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onstructing China's systematic body of knowledge regarding foreign literature.

Keywords: Wang Shouren; 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realism; body of foreign literature knowledge

Authors: **Liu Yang** is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English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realist fiction and theory (Email: yang.liu@nju.edu.cn). **Wang Shouren** is Nanjing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anjing 210023,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realism, and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Email: srwang@nju.edu.cn).

外国文学研究是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

刘洋（以下简称为刘）：王老师，您好！非常高兴和荣幸与您进行此次访谈。您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教学、译介等多方面均做出了卓越贡献，许多后辈学人都对您的学术生涯非常感兴趣。您曾描述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了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世界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历程。请您首先谈谈作为您近40年学术旅程起点的英国文学研究。

王守仁（以下简称为王）：英国文学研究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百余年的学术史。自近代中国高校设置英语科目和专业以降，英国文学在课程设置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进入南京大学读本科的。当时的英语专业文学课比重大，但只开设英国文学，我上了两门必修课程：“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读”。后来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都是19世纪英国文学。读博期间给美国的*Studies in Browning and His Circle*期刊投稿，1988年发表的论文是讨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文学创作。1990年在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英文专著*The Theatre of the Mind: A Study of Unacted Drama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我对英国文学有浓厚兴趣，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一直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学术探索。从英国学成回国后我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英国文学研究论文，出版了

《英国文学简史》（2006）《20世纪英国文学史》（2006）《英国文学批评史》（2012）《英国文学史论》上下卷（2016）。作为英语文学的本源和重镇，英国文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保持着世界性影响。五四时期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别求新声于异邦”（68），介绍了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郭沫若谈及雪莱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声称“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19）。马克思关于狄更斯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论述对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我的导师范存忠先生研究18世纪英国文学，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注意到中国文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和英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我致力于英国文学研究，是继承南大的学术传统。在历史长河中，世界各国文学文化是在相互联系、交流、借鉴、影响中向前推进的。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富有生机和活力，吸引着我不断地追索其中深刻的文学话题，并对其在新时代产生的新问题保持关注。

刘：您在研究英国文学的同时开展美国文学研究，取得同样甚至更为丰硕的成果。您曾担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对推动中国的美国文学研究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请问您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文学？又是如何开展美国文学研究的？

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职责。20世纪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坛崛起，从过去英国文学的一个部分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研究美国文学，有助于我们认识创造了美国文学的美国人民，也可以借鉴美国文学的发展经验。改革开放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对美国文学的研究比较薄弱。1980年代末我学成回国后，感到有必要加强我们国家的美国文学研究，便在开展英国文学研究的同时，研究美国文学。我在国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英国文学，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的主题则是美国文学，我用英文撰写“Thoreau and Confucianism”刊登在《外国语》1988年第2期。文学记录历史进程，反映社会生活。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我始终将美国文学的发展与美国社会历史相联系，注重揭示其内在关联。如讨论20世纪上半叶美国作家威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小说《一个失落的女人》（*A Lost Lady*, 1923）的文章将女主人公视为“连接拓荒时代与金钱时代的中间人物”，认为她的故事“折射出历史的发展变化”，即美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形（“论《一个失落的女人》” 147）。发表在《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3期上的文章“汽车与50年代美国小说”以塞林格（J. D. Salinger）、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和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作品为例，说明这些作家“通过描写汽车时代的社会生活来表现美国文学中‘出走’这一母题，从而赋予其作品社会批判意

义和鲜明时代特征”（112）。我对美国族裔文学关注尤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国非裔、华裔、墨西哥裔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我撰写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1999）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Toni Morrison）小说创作的学术专著。阅读莫里森的小说，读者可以了解到从17世纪一直到今天的美国黑人社会史。我在该书“绪论”中指出：“美国黑人文学是在历史、现实、非洲文化、白人文化等诸因素合力作用下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3）。莫里森的作品“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在一起”（25），因此，研究莫里森必须结合她所生活的时代，以挖掘其作品中蕴含的社会历史内涵。我和刘海平教授共同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思想。正是这种关注现实生活的文学研究可以贡献出关于美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有用知识，而这是我们外国文学工作的价值所在。

刘：进入21世纪，您进入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即从英国和美国等国别文学拓展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从全球视角审视世界文学版图，获得对当代外国文学系统深入的认知。您是如何跨越国别疆界，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开展外国文学研究的？

王：我虽然在英国接受研究生教育，后来又两度去美国访学，但较早就认识到英语文学并非都在英美，有意识地关注非英美国家英语文学的发展。2007年我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的老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并于2011-2015年间担任会长。2012年11月我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明确指出“促进英语国别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的任务”。世界文学视域的形成与我参加的几个国家级项目有关。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吴元迈先生启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撰写工作，邀请我参加并负责英国文学部分撰写。第二年该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吴元迈先生担任主编，北京大学陶洁教授和我担任副主编。该文学史著作于2004年问世，2008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我除了撰写每一卷中20世纪不同时期的英国文学发展史章节之外，还担任第2卷“1914年至1929年的外国文学”主编，对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发展状况进行全方位考察。这一卷涉及近40个国家与地区的文学，涵盖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俄苏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等主题。在编纂这一卷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培养起了文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开始有意识地将外国文学视作整体，从世界范围看待问题，认识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年代末，现代主义成为了跨越国家与语言边界的世界性文学与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我有意识地深入到具体

的社会历史状况当中,挖掘某种文学潮流生成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原因。吴元迈先生在全书的“绪论”中指出,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为了“新世纪的前行,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1)已经逝去的20世纪,同时它是一部“涵盖20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18)。整部文学史将展现外国文学的共性规律与各国别地区的个性特点相结合,又将扩展全球视野与联系中国实际相结合,内容详尽,气势恢宏。它是我进入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契机。

刘:您在第2卷“概论”中指出现代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诚然,不仅仅是一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四卷本中所称的“战后”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否请您谈谈这部著作的撰写情况?

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卷本《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2019)在一定意义上是“20世纪外国文学史”课题研究的延续,但在项目的目标规划、总体设计、内容安排、工作思路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我主持这个项目,将历史进程与文学进程并置考察,是基于对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认知,即一定时代的文学是在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二战后外国文学具有与以往历史时期外国文学不同的艺术特征和时代风貌,而要揭示战后外国文学独特的艺术进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后者放到生产它的战后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和辨析。

在具体操作层面,《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一方面按照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发生发展脉络,揭示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深刻背景,分析外国文学的特点,另一方面按照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标志性事件的事件节点,阐述战后外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四卷本分别探讨战后现实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全球化视域下的当代外国文学、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四个领域的问题。这样的分卷本划分方式与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作具有明显不同。四个领域的提出是站在整体性的角度去观照世界文学,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以全球视域对外国文学进行考察的结果。在研究西方文学的同时,关注非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从而展示波澜壮阔的世界文学全貌。有评论者提出,该书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突显了战后文学差异化中的统一性与全球化中的区域性特征”(徐兆正 169),是一种“总体性”的外国文学研究方式。四卷本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中展示战后外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形态和特性,阐述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对于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深刻理解中外文学文化异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创新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

刘：我注意到，您在谈论自己的上述研究时，经常提到“生活”、“社会”、“历史”这几个关键词，那么您是如何理解文学与上述几个关键词之间的关系的？

王：要厘清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就要明确我们对文学的定义。从我个人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实践出发，我认为文学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对于文学批评而言，生活是与意识形态、审美、语言、伦理、表演等同样重要的概念，不应该被文学的研究者忽视。文学作为一种书写艺术，是生活的审美表现，时代的文化表征；生活则是文学的源泉和土壤，是文学的表现对象。

生活(life)作为关键词，曾出现在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的《现代小说》(“Modern Fiction”, 1919)一文中。她讨论了与生活关系最紧密的文学体裁——小说，并表达了对生活的看法，认为“生活不是一系列对称的车灯，而是一圈光晕，一个半透明的罩子，它包围着我们，从意识开始到意识结束”，而小说家的任务则是“表达这种变化多端的、未知的、不受限制的精神”，它们才是“小说的适当材料”(128)。这说明生活难以被固定的艺术范式框定和描述，但其存在又不可被否定。这种幽微难言的玄妙正是文学表达的独特之处。文学以个体和个体的生活作为表征的对象，但个体和个体的生活不是自始至终恒定不变，个体也不仅仅生存在自我构筑的牢笼之中，而是时时刻刻与外界发生关联、产生矛盾，并且在关联与矛盾中运动、发展、变化。因此，文学在细致入微地表现生活肌理的同时也触及历史发展的脉搏。另外，文学作为“事件”，是历史的参与者，又积极干预生活，促使社会发生变革与进步。

刘：您在《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的“总序”中谈到该书的研究思路时说道：“通过勾勒战后历史进程，分析战后政治、经济背景及重要社会文化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解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进而梳理和描述文学的产生、流通、变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您的研究基本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请问您如何理解社会历史批评？

王：我的外国文学研究遵循的是社会历史批评范式，正如陈众议先生所说：“延承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派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取向”(“话语之弧”150)。社会历史批评将文学与历史-社会相联系，关注它们之间的影响与互动。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的奠基者别林斯基(Vissarion Grigoryevich Belinsky)指出：“现实与艺术和文学，正如同土壤与在它怀抱里所培育的植物一样”(428)。文学根植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我认为，文学是作家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在讲述对生

活的具体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展现人性，描写生存环境。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作品中呈现的生存环境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因此，文学被视为生活的审美表现和时代的文化表征，社会历史进程对文学的发生发展产生影响。我在《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的“概论”中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到来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和复杂的文化思想背景”（1）。“文章合为时而著”，文学折射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涉及两个“进程”，即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外国文学进程，分析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后现代主义文学为例，它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在各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不同步，并且因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带上特有的民族性印记。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现代主义在美国风头已过，然而在俄罗斯却开始了以后现代主义为文学标志的俄罗斯文学新时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解构和颠覆的主要对象是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为代表的苏联官方文化，苏东剧变使后现代主义文学得以“走出地下”，“在俄罗斯的合法化、在广大读者中的流传是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要求和结果”（413）。在讨论新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流变与影响时，我将“9·11”事件视为对后现代主义主义的“致命一击，这反映了历史进程对文学进程的决定性影响”：“9·11”事件中近三千人丧生，“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向世人昭示，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并非解构主义所宣称的那样可以消解，作家不能也不可能无视周遭生活而沉溺于文字游戏”（26）。这些论点都是建立在文学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基础之上。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人们的观点、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47）。马克思主义将文学艺术纳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中，为人们认识和界定文学的社会性以及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研究文学问题提供了宏观的解释框架和理论基础。与社会历史批评相对立的是形式批评。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韦勒克（René Wellek）与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9）曾倡导“阐释和分析文学作品自身”的“内部研究”（139），将有关历史和社会的研究隔离于“外部研究”。“新批评”作为“内部研究”的典型范式，专注于“精致的瓮”的文本结构，但实际上“新批评”本身亦是特定历史-社会语境的产物。文学文本内涵丰富，象牙塔里单一的形式批评将世界符号化，使外国文学研究脱离现实生活，面临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时，无法贡献有关当代外国的有用知识，而社会历史批评有助于扭转文学批评日益边缘化的趋势。将文本“嵌入”（embedment）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在文学与历史-社会的各种关联中揭示作家对生活 and 时代的洞见，也可以更加有效地分析作品的形式及其变化。

刘：您提到的现实主义文学，可否被认为是与生活、社会和历史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文学创作模式？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何以成为创新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口？

王：现实主义文学确实与生活、社会 and 历史的联系最为紧密。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讨论现实主义小说之时曾提出“生活性”（liveness）概念，“真正的作家”应该能够“把握住生活的全部范畴”（179）。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现实主义理论均强调现实主义与生活、社会、历史之间的紧密关联。社会历史批评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现实主义与社会历史批评的核心命题具有内在逻辑的自洽性和一致性，自然成为创新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的突破口。

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狭义的现实主义如韦勒克所言，是一个“时期概念”（2），指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广义的现实主义，是小写的 *realism*，泛指自觉或不自觉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创作方法是作家艺术地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方法。人类自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出现，就运用一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包含创作精神、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段三个要素。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指作者所秉持的文学观，即在文学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真实，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的作品可视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或特色的文学。作为具体手段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则是包容并蓄，多种多样，服务于作家表现生活、表征时代的目的。现实主义就其创作方法而言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维度，具有各种形态。

从社会历史批评基本立场出发，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对现实主义进行体系性建构，试图整理出一套系统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现实主义的知识谱系建构可以沿核心概念与批评范式两条轴线展开——一方面是现实、摹仿、真实、虚构等需要纳入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之内进行系统性辨析与考量的关键术语，另一方面是认知、审美、情动、跨媒介等多维度的批评范式。在现实主义知识谱系之中，这些结构性关键词相互渗透融通，互为支撑，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正是在这样一个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审视、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社会历史批评理论与方法得以不断丰富内涵、创新发展。

三、努力建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

刘：我了解到现实主义文学原理研究是您近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课题，旨在建立起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新范式。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确，文学研究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请问您是如何理解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

王：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知识”是一个核心词。我们说，知识是指人

们通过感知、思考、学习等方式获得的信息、理解和认知，它是主体与他者交互作用所获得认识与经验的总和，包括了世界上的各种事实、原理、规律和技能。人类通过思维活动，从感性经验到理性思考，从具体到抽象，从表层到深层，不断地积累和扩展自己的认知和理解。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对其进行分类，形成各个学科领域专门化、系统化的知识。个别的、具体的知识概念经过系统集成构成具有稳定结构、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是对相关领域结构化的整体性认识和本质性理解，体现了知识的连贯性和系统性特点。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它“外”字当头，有别于中国文学，指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语境下研究世界各国文学，贡献关于外国文学的知识，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目前大部分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中文为载体，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是为中国读者服务的，“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陈众议，“二为方向”6）。汉语中的“知识”两字可分开来解释：“知”是知道、了解，“识”是见识、思想观点，两者不可完全分割，相互关联，但大致还有所区别。我认为，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在“知”的层面主要有译著、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史等，在“识”的层面主要是论文专著，表现为学术研究的见识和思想观点。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需要关注四要素，即译著、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史和论文专著，特别是后者涉及到文学批评思想。近年来各种批评理论层出不穷，如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理论等，而社会历史批评在当今文学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之一。

刘：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的译著要素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的译介，请您谈一谈翻译对于我们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并介绍一下您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

王：外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翻译是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基础要素。翻译为中西方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外国文学翻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体裁、主题与形式，直接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甫一公布，出版社即迅速推出获奖作家作品译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拓展我们的阅读视野，去关注本来我们忽视的优秀作家作品。这一现象表明，外国文学翻译是一个“无涯”的知识体，其容量需要不断扩大，其疆界在不断突破。我主张外语教师，不论是研究语言还是文学，都要做点翻译。我自己进行翻译实践，发表了各类翻译作品。我的外国文学翻译涉及领域比较宽泛，既有英国经典作家哈代(Thomas Hardy)的小说《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1878)，也有加拿大当代作家阿瑟·黑利(Arthur Hailey)的畅销书《晚间新闻》(*The Evening News*, 1990)，我撰写的莫里森研究专著《性别·种族·文化》书后附有作品节译，选自莫里森的《爱娃》(*Beloved*, 1987/ 又译《宠儿》)等8部小说以及她的获

奖演说全文。我担任《赛珍珠作品选集》副主编，译著有她的长篇小说《群芳亭》（*Pavilion of Women*, 1946/ 合译）和短篇小说《海浪漂来的女人》（“The Woman in the Waves”, 1976）。除了赛珍珠（Pearl S. Buck）和莫里森之外，我还翻译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短篇小说《闯入者》（“An Intruder”, 1993）。戈迪默的文学创作揭露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描写了不同历史时期黑人与白人的命运。2005年她主编短篇小说集《爱的讲述》（*Telling Tales*, 2004），收选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21位当代作家的短篇佳作，将出版利润和作家所得税全部捐献给艾滋病教育和防治事业。我有幸受邀翻译南非作家代表大会主席恩代贝尔（Njabulo S. Ndebele）的短篇小说《儿子之死》（“Death of a Son”, 1996），不仅促进了南非英语文学在我们国家的传播，还见证了外国文学翻译介入现实生活、直接帮助防治艾滋病事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我曾写过“论译者为消费者”文章，认为译者根据文学原著创造了一个新的“语言现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每一个译文都是一个文本（text）”（46）。在“论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我接受本雅明把译文看作是原著“来世再生”的观点，指出“原著在转胎投世过程中经受了变形，因此，译文尽管是原著生命的延续，它与原著必定不一样”，是可以与原著“平起平坐”（38）的新文本。总之，外国文学的译著是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的译介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刘：您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外国文学学科条目的编写工作，您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中的作用有什么认识？

王：百科全书汇集人类一切门类知识或某一门类学科的知识，提供较为完备的概要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全面反映科学文化发展新成就、新发展、新变化，构建中华民族现代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了外国文学知识体系。作为第三版美国文学分支主编，我在编写过程中确保条目体现专业性、权威性和时效性。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读者有多种渠道获得信息，如果条目内容不可靠、不完整、不权威，读者就不使用了。专业性和权威性来自条目的质量，质量是生命线。根据计划，第三版在一二版条目的基础上增加2倍，实际新增330多条，一二版修订30条。新增条目有作家作品条目，如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和格吕克（Louise Glück）等，也有文学类别、重要文学现象、学派和流派条目，如少数族裔文学、科幻文学等，还有对作家进行重新评价，目的是能呈现美国文学的全景和新发展。我邀请术有专攻的专家参与这个基础文化工作，自己撰写了50多条，包括当代作家如德里罗（Don DeLillo）、多克托罗（E. L. Doctorow）、库弗（Robert Coover）、麦卡锡（Cormac McCarthy）以及科幻作家勒奎因（Le Guin）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权威知识宝库，为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来源。

刘：您前面提到在外国文学史方面您做过许多工作。请问在文学史编纂的过程中，您是否也考虑到了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

王：我在外国文学史编纂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外国文史著作涵盖通史、断代史、国别史、文类史。文学史是关于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叙述。在“知”的层面，文学史书写涉及大量文学史实，如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史是中国读者获得外国文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同时，文学史也包括了“识”，是文学史家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析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谱系。文学史作为对文学史实的表征和解释，会因文学史家的身份、立场、历史观不同而不同，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我曾为李赋宁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撰写书评，指出文学史叙述具有历史性和建构性，“写文学史涉及对文学史实进行系统化、结构化，是一个概括、抽象、提炼的过程”（“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146）。

我以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为指导来书写外国文学史，强调社会历史与文学之间存在深层的关联。《新编美国文学史》第4卷重点讨论的部分作品是基于它们蕴含的社会历史价值。文学作品隐含着作者对生活的认识、态度和价值取向，因此，忽视社会存在和历史背景不足以深入理解作家、作品。但是，文学批评要避免将文学简化为对社会历史的机械反映的倾向。我创新外国文学书写方式，努力探索、理解和揭示出作家、作品与时代三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关于文学史的叙述隐含着从背景到作品的途径，但走的是曲径通幽的路子。

人们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可分为三种，即实用的、科学的和审美的。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生活的审美表现，在编纂外国文学史的过程当中，我将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相结合，作为评判作家作品的标准，注重把握文学思潮变革的动向与规律。如我撰写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乔伊斯”（James Joyce）一节首先充分肯定了《都柏林人》（*The Dubliners*, 1914）等早期作品在表现爱尔兰民族精神与集体意识方面的意义，其后便将重心转向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以及他对小说体裁的独特贡献。我将《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1916）放在作为整体的小说史中进行考察，赞扬“这部小说打破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128），通过对《尤利西斯》（*Ulysses*, 1922）《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 1939）作品中词语、句式、叙述、结构、文体等比照分析，论证乔伊斯对传统的叙事范式进行变革，将意识流引进现代小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语言和叙事方式，并从“乔伊斯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倾向与文体之间的关系”（135）出发，评价他对英语的使用。

作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当代外国文学工作者，在编纂文学史的过程中，我注意与西方文学史家保持批评距离，突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力求对外

国文学的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解、认识和结论。如《新编美国文学史》在编纂的过程中恰逢美国学界对文学史编写展开论争，以《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和多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94-2003）为代表的新文学史书写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摒弃了连贯性和系统性的编写原则，强调断裂性和多样性。然而我们编写的美国文学史有自己的出发点和读者受众，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学史论背景，所以在对美国学界的文学史论争保持充分了解的同时，我们采用了自主的编写原则，努力保证四卷本的连贯、完整和系统性，建构起体系化的美国文学知识图谱。并且，我们对美国主流文学史较少关注的中美文学关系作为重点进行考察：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与儒家学说的关系、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艾略特（T.S. Eliot）诗歌在中国的译介、道家思想在奥尼尔（Eugene O'Neill）戏剧创作中的反映以及他的戏剧对中国话剧的影响、赛珍珠对重塑中国人在西方文学中的形象所做的贡献以及她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过程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在完全由美国学者作者主编的文学史作品中难得一见，是中文世界中关于外国文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您提到了中国学者研究的主体性，我想请问您，建构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如何体现中国特色？

王：前面我将知识分为“知”与“识”两个层面，我们应该看到，以事实信息形态被人们所知道、了解的知识是有疆界的，具有局限性。我们以大百科全书为例。在英美世界被奉为经典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美国作家“赛珍珠”条目篇幅不长，对其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作品《龙种》（1942）也只提了书名，一笔带过。读者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仅能获得关于赛珍珠非常有限的知识。相比之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赛珍珠”作家条目向读者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作家生平、文学创作成就、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做贡献的概要解释，还有《大地三部曲》《龙种》和《同胞》三部中国题材小说独立的作品条目。可见，关于世界的知识是人为建构的，受各种因素影响，存在差异性。我认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应该注意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需求，这其中包括价值取向、中国元素、问题意识、话语系统等问题。我在《当代外语研究》2019年第5期发表的文章“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中提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价值引领；体现当代中国学者的主体性，这里涉及到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和批评立场，增强批判意识，做出独立判断；充分利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做出原创性成果；深化中外文学与文化的理解和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全球视野审视研究对象”，“彰显世界文学的整体性”（9）。上述几点在推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中或

可资借鉴。

刘：感谢您如此详细地介绍自己的学术历程并分享对于当下外国文学研究事业的想法。我在与您对谈的过程中，脑海里时常浮现出“旧学加邃密，新知转深沉”一句话。在您旧学与新知的启迪下，相信您的后辈学人一定会从此次访谈中有所收获，并继续开拓社会历史批评的广阔前景。

王：谢谢。

Works Cited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9年。

[Belinsky. *Selected Works of Belinsky*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59.]

陈众议：“‘二为方向’与外国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几个问题”，《外国文学动态研究》1（2019）：5-14。

[Chen Zhongyi. “The Policy of ‘Literature and Art for People and Socialism’ and a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1 (2019): 5-14.]

——：“话语之弧——中国外国文学学会2020年度全国理事会暨‘外国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外国文学动态研究》1（2021）：149-151。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FLS Council Meeting & the Symposium on ‘Constructing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ystem of Foreign Literature’.” *New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1 (2021): 149-151.]

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4（1923）：19-39。

[Guo Moruo. “Preface to Shelley’s Poems.” *Creation* 4 (1923): 19-39.]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5-120页。

[Lu Xun. “On the Power of the Satirical School of Poetry.”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Vol. 1.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65-1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Marx, Karl Heinrich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under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王守仁：“汽车与50年代美国小说”，《当代外国文学》3（1996）：112-117。

[—.“Automobiles and American Fiction in the 1950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1996): 112-117.]

——：“关注非英美国英语文学”，《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15日，第5版。

[—.“Calling for Attention to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Outside the UK and the USA.” *Social Sciences Weekly*. 15 November 2012: 5.]

——：“走中国特色美国文学研究道路”，《当代外语研究》5（2019）：4-11+129。

- [—,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5 (2019): 4-11+129.]
- : “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 《外国文学评论》4 (2001): 146-148。
- [—,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 of Our Tim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4 (2001): 146-148.]
- : “谈翻译的忠实——读本雅明《论译者的任务》”, 《山东外语教学》2 (1996): 36-38。
- [—, “On 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Reading Walter Benjamin’s ‘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s Journal* 2 (1996): 36-38.]
- : “论《一个失落的女人》中的双重视角”, 《当代外国文学》2 (1994): 142-147。
- [—, “On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of *A Lost Lad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1994): 142-147.]
- : “论译者是创造者”, 《中国翻译》3 (1992): 45-48。
- [—, “A Translator, A Creator.” *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3 (1992): 45-48.]
- 王守仁等: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2卷 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年。
- [Wang Shouren et al. *Post-WWII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I: Postmodernist Literature*.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
- :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4卷 新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年。
- [—, *Post-WWII World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V: Trends in the 21st 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Nanjing: Yilin Press, 2019.]
- 王守仁、吴新云: 《性别·种族·文化: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Wang Shouren and Wu Xinyun. *Gender, Race and Culture: A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Novels*. Beijing: Peking UP, 2004.]
- 詹姆斯·伍德: 《小说机杼》, 黄远帆译。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 [Wood, James. *How Fiction Works*, translated by Huang Yuanfan. Kaifeng: Henan UP, 2015.]
- 弗吉尼亚·吴尔夫: 《普通读者I》, 马爱新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
- [Woolf, Virginia. *The Common Readers Part I*, translated by Ma Aix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 吴元迈等编: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卷 世纪之交的外国文学》。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年。
- [Wu Yuanmai et al. (eds).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 Foreign Literature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 : 《20世纪外国文学史·第2卷 1914年至1929年的外国文学》。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年。
- [—,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Literature Volume II: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1914 to 1929*. Nanjing: Yilin Press, 2004.]
- 徐兆正: “把握战后世界文学总体性的尝试”, 《当代外国文学》2 (2020): 166-170。
- [Xu Zhaozheng, “An Attempt to Grasp the Totality of World Literature after WWII.”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0): 166-170.]